

中世纪英国铸币师群体研究(973—1158)

崔洪健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在英国推行货币定期重铸制度期间,铸币师形成了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多出身于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主要负责货币的铸造和兑换;他们职业生涯较长,且可以在不同铸币厂之间流动。同时,国王授予的特权和赠予的财富以及在货币铸造与兑换中的获利,使得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故在中世纪英国的城市里,铸币师被认为是除王室官员之外最重要的社会群体。

关键词:中世纪;英国;铸币师群体

中图分类号:K56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5)6-051-056

自 973 年埃德加货币改革以来,英国一直推行货币定期重铸制度,这使得货币铸造更为规范和集中,与此同时,铸币师队伍也日趋壮大,并最终形成一个社会群体。对于中世纪英国铸币师的研究,西方学者的著述较为丰富,^①而国内则鲜有学者涉猎。

一、铸币师群体的社会来源

铸币师不仅需要具有相关的专业技能,而且也需要具备读写等识字能力。^{[1]546-548}同时,货币铸造和兑换能获得丰厚的利润,这吸引了不同阶层的人士参与其中。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至 12 世纪中期,铸币师群体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社会阶层。

首先,盎格鲁—萨克晚期的铸币师多出身于金匠和手工业者。在 11 世纪中期之前,几乎没有直接记载铸币师身份和地位的资料。一些学者根据特许状和遗嘱中的相关记载,推断铸币师主要出身于金匠和手工业者。^{[2]168}当时的铸币师多为拥有娴熟技能的手工业者,他们不仅掌握贵金属冶炼和精加工的知识,^{[3]27}而且还制造铸模,直接参与货币的铸造。^{[4]59-60}从埃塞尔雷德二世时期起,铸币师直接参与货币铸造的现象有所改变。他们开始作为货币事务的管理者,严格控制手工业者和其它劳动者为其进行试金分析、切割原坯和锻造货币等活动。^{[3]26[4]61}随着铸币师地位的上升,铸模亦开始由专门的雕刻师来制造。埃塞尔斯坦曾颁布法令,规定在整个英格兰只准通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世纪英国铸币师群体研究”(2015-GH-301)。

作者简介:崔洪健,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世纪英国货币史、欧洲经济—社会史。

①笔者所见主要有:Pamela Nightingale, Some London Moneyer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nglish Mints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Numismatic Chronicle, 1982 (142); George C. Brooke, The Medieval Moneyers, British Numismatic Journal, 1931-33 (21); R. S. Kinsey, Anglo-Saxon Law and Practice Relating to Mints and Moneyers, British Numismatic Journal, 1958-59 (29); Ian Stewart, Moneyers in the 1130 Pipe Roll, British Numismatic Journal, 1991 (61); Ian Stewart, King John's Recoinage and the Conference of Moneyers in 1208, British Numismatic Journal, 1989(59); Veronica J. Smart, Moneyers of the late Anglo-Saxon coinage; the Danish dynasty 1017-42, Anglo-Saxon England, Volume 16, December 1987; D. J. Symons, The Moneyers of the Worcester Mint, 1066-1158: Some Thoughts and Comments, in Barrie Cook and Gareth Williams, Coinage and History in the North Sea World c. 500-1250, Leiden; Boston: Brill, 2006.

行一种类型的货币,这在客观上证明了雕刻铸模的权力已经从铸币师手中分离出去,并由国王统一管制。^{[3]27}

其次,盎格鲁-撒克逊晚期部分铸币师出身塞恩(Thegn)阶层。在诺曼征服之前,部分铸币师出身于国王的塞恩,这可以由当时的特许状所证明。以约克铸币厂为例,当地的货币上出现了铸币师奥苏尔塞恩(Osulf Thein)和奥尔夫克尔塞恩(Ulfcetel Theginc 或 Ulfcetel Thaginc)^①等字样,其中奥苏尔为埃塞尔雷德二世的塞恩,而奥尔夫克尔为忏悔者爱德华的塞恩。^{[5]305}据《末日审判书》记载,出身塞恩的铸币师不仅监督货币的铸造和发行,而且有时也直接参与货币的铸造。^{[6]39}

再次,诺曼征服之后的铸币师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阶层。随着 11、12 世纪城市的发展和贸易的繁荣,铸币师群体的来源更具多元化。^{[7]69}铸币师群体多出身于显赫的市政官员和富裕的商人以及手工业者等市民阶层;同时,部分的铸币师还来自于为国王服务的随从以及地方的主教和佃农等阶层。

在诺曼征服之后,铸币师逐渐出身于显赫的市民阶层,且以从事市政和商业的皇室官员、城市议员、法官、金匠和商人为主。^{[2]168}铸币师出身城市议员的观点被众多学者所接受。在 12 世纪的前 50 年,伦敦的铸币师多出身市政议员,而其它城市的铸币师有着相同的社会地位。^{[6]8}如铸币师斯珀林(Sperling)是当时伦敦的市政议员,他为伦敦和黑斯廷斯铸币厂服务;^{[7]69}约克的铸币师托马斯·菲茨尤尔夫(Thomas FitzUlf)也是一位出身于商人行会的市政议员,曾被赠予霍尔德内斯的博威奇镇(the vill of Bonwich)。^{[6]8}除了城市议员外,铸币师还出身于市长和法官等市政官员。伍斯特的市长伍尔弗里克就是当地铸币厂的铸币师。^{[1]588}林肯的 12 名法官中有 6 位为当地铸币厂的铸币师;^{[7]70}约克由 12 人组成的陪审团中也有 6 位为当地的铸币师。^{[6]8}

除了市政官员外,铸币师还出身于其它多个阶层。其中部分铸币师出身于商人阶层。据对温切斯特的铸币文献研究发现,多个铸币师是富有的商人,这与货币铸造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有关。^{[5]305}伍斯特的货币铸造也能证明这一点,当地

的铸币师多为商人。^{[1]348}同时,部分铸币师和当地的金匠往往是同一个人。金匠和铸币师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经常在工作中一起合作,如雇佣相同的工人。^{[7]71}伍斯特的巴尔德里克(Baldric)既是铸币师,也是金匠,并且他之后的几代人继承了铸币师和金匠的职业。^{[1]561-564}此外,地方的主教和国王周边的随从也是铸币师的重要来源。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的国王授予多个地方的主教铸币权,这为他们参与货币铸造提供了可能。西蒙·菲茨罗伯特(Simon FitzRobert)曾是奇切斯特的一位主教,但也是当地铸币厂的一位铸币师。^[8]有时,为国王服务的医生和裁缝等人也参与货币的铸造,成为铸币师。^{[4]65}甚至有学者认为,佃农也是铸币师的重要来源之一。如在 11 世纪末的伍斯特铸币厂,5 位铸币师来自当地的佃农。^{[1]587}

在英国推行货币定期重铸制度期间,铸币师主要来自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也有部分出身于为国王服务的侍从、地方主教和佃农。从以上社会来源来看,铸币师群体的构成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二、铸币师群体的社会规模

货币史学家在界定中世纪英国铸币师群体的社会规模时,面临着无法准确估算的难题。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所造成:第一,有关中世纪英国铸币师的直接资料几乎没有,学者们只能根据已发掘窖藏货币上的信息对铸币师的名字进行确认,并进行归类和分析,但是发掘的货币仅是中世纪货币的一小部分,这就使得通过这一方法估算的铸币师的规模难免有失真实。第二,英国推行货币定期重铸制度期间的铸币师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全国各地的铸币师在自己独立分散的工作间里进行铸造,并到所在郡的各个地方进行货币兑换,这就很难估算他们的具体人数。第三,由第一部分可知,铸币师来源于多个阶层,具有多重身份,这也在客观上加大了对规模估算的难度。

尽管在推算铸币师群体的社会规模时存在以上难题,但是学者们还是根据相关铸币法规中的记载和已发掘的货币类型以及货币上的信息对 973—1158 年间英国铸币师的人数进行了初

① Thein, Theginc 和 Thaginc 是 Thegn 一词的不同表达形式。

步估算。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国王在授予某一城市铸币权的同时,还规定了当地拥有的铸币师人数。如阿瑟尔斯坦曾规定伦敦为8名铸币师,坎特伯雷为7名,而其它自治市至少有1名;^{[3]15}埃塞尔雷德二世也曾规定每一个郡府级的铸币城市只能拥有3名铸币师,而其它城市仅能有1名。^{[3]20}事实上,每一个自治市拥有的铸币师人数是较灵活的,并不仅限于法律规定。温切斯特在10世纪70年代有8名铸币师,而到克努特发行“四叶”(Quatrefoil)型货币时拥有33名铸币师。^{[6]13}

973年货币定期重铸制度确立之后,中世纪英国的货币铸造日益规范;同时,为了换取与维京人之间的和平,英国国王向其支付大量的“丹麦金”,这在客观上促使了货币铸造规模的扩大。因此,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上半期,英国的货币铸造达到了一定规模,随之铸币师的人数也增至500余人。在973—979年间埃德加发行“改革”(Reform)型货币时,铸币师人数为192人;到了997—1003年间埃塞尔雷德二世发行“长十字”(Long Cross)型货币时,铸币师人数已增至306人。^{[6]14}到克努特发行“四叶”型货币时,铸币师人数增至542人,达到了顶峰,此后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在其发行的“尖头盔”(Pointed Helmet)型货币时为412人,到了“小十字”(Small Cross)型货币时为铸币师人数为316人。^{[6]14}

从11世纪中期开始,铸币师人数开始出现持续下降。1040年之后,随着中欧哈尔兹山附近银矿的枯竭,英国与弗里斯兰之间的贸易出现了衰退,流入的外来白银锐减。^[9]白银供给的减少导致货币铸造量的降低,铸币师的人数也随之下降。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的前半期,铸币师人数为210—220人,到其统治的最后两年已下降至162人。^{[6]14}在1087—1090年间威廉二世发行“帕克斯类型”(Paxs type)货币时,68座铸币厂铸币师的总人数不到177人;到亨利一世发行第14种类型的货币时,53座铸币厂的铸币师为142人;到斯蒂芬发行第7种类型的货币时,47座铸币厂的铸币师为101人。^{[6]14}

到了亨利二世时期,由于新的初具契约性质的货币制度的确立,货币重铸几十年才进行一次。重铸期间开放大量的地方铸币厂,铸币师人

数也会随之增加,平时则较少。1154年亨利二世即位之后,为了加强对铸币权的控制,他对原有的货币体制进行了改革,不仅结束了货币定期重铸制度,而且把货币铸造集中在几个大的铸币厂,并替换了全体铸币师,故铸币师人数出现了大幅下降。伦敦铸币厂在1154—1158年有铸币师14人,到了1180年下降至4人。^{[6]48}之后,铸币师人数进一步下降。以伦敦、坎特伯雷、温切斯特和约克等19座铸币厂为例,在1189—1205年间铸币师为18—31人,而到1207—1247年下降至5—22人。^{[6]61}

整体而言,铸币师群体的社会规模较小。即使在货币重铸制度稳定发展的时期,铸币师也仅为500余人。当然,受白银供给和“丹麦金”收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货币铸造中所需铸币师人数多少不一,而其规模也会随之变化。

三、铸币师群体的空间分布

受政治和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世纪英国的铸币师群体由不同区域的人群构成。学者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根据不同的发音和拼写对铸币师的名字进行分类,进而探讨了他们的起源和区域变化。

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货币上铸币师的名字主要以本土古英语为主,尤其是在伦敦和南部地区中最为明显。^{[5]280,303—304}但在不同的区域,影响铸币师名字的因素又不尽相同。由于“丹麦法区”(Danelaw)^①深受维京人入侵和定居的影响,铸币师的名字多体现斯堪的纳维亚因素。如在约克、切斯特、林肯、密德兰和东盎格利亚等地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名字较为普遍。在埃塞尔雷德二世统治晚期,约克铸币师名字中的绝大多数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名字;^{[7]72}同时,林肯当地记载的55位铸币师中有25位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名字,而切斯特的铸币师名字中1/4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10]179}在丹麦国王克努特及其儿子统治时期(1016—1042年),斯堪的纳维亚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如在切斯特及其周围活动的铸币师名字中近一半来自斯堪的纳维亚。^{[5]248—249}

同时,随着与欧洲大陆政治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铸币师中的日耳曼因素也有所加强。大陆日耳曼人的名字主要出现在南部沿海地区,如温

① 后人把丹麦人的统治区域称作“丹麦法区”,主要包括东盎格利亚和诺森伯里王国以及麦西亚王国的部分地区。

切斯特的西博达(Siboda)和埃克赛特的伊森格达(Isengod)。^{[7]72}自从 9 世纪末欧洲大陆的铸币师来到东盎格利亚起,中世纪英国铸币师群体的名字更具多元化。^{[10]176}在埃德加统治时期,大陆日耳曼人的名字在所有铸币师名字中占到 17—25%。^{[10]177}

诺曼征服并没有对铸币师群体造成冲击,但是从 12 世纪早期开始,诺曼人的名字大量出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诺曼征服并未打乱盎格鲁—撒克逊晚期铸币师的职业生涯,原有的铸币师继续其铸造活动。在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时期的 400 位铸币师中,有超过 375 位为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的。^{[6]15}从当时铸币师的名字来看,其中仍以本土古英国名字为主。^{[1]587}以威廉二世时期参与发行“帕克斯类型”货币的 165 位铸币师的名字为例,其中斯堪的纳维亚名字为 19 个(约占 12%),大陆日耳曼人名字为 4 或 5 个,而本土古英语名字为 141 或 142 个(约占 84%)。^{[6]15}随着诺曼人的到来和定居,他们对英国的影响日渐增强。因此在 1100 年之后,铸币师名字中的古英语因素逐渐失去其优势,而诺曼人的名字开始出现在货币上,如 Willems, Raufts 和 Rodberts 等,并在斯蒂芬统治时期大量涌现。^{[7]72-73}在亨利二世时期“十字—小十字”(Cross and Crosslets)货币流通时期,65 位铸币师中有不到 1/3 为古英语名字,超过一半为诺曼人名字,其中仅有少数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大陆日耳曼人的名字。^{[6]15}

总之,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丹麦法区”的铸币师多体现斯堪的纳维亚因素,南部的铸币师多体现本土古英语因素,而东南部沿海的铸币师受到大陆日耳曼因素的影响;到了诺曼王朝时期,铸币师群体又受到大陆诺曼人的冲击。从影响铸币师的多种外来因素来看,中世纪英国铸币师的空间分布深受本土与周边文化交流的影响。

四、铸币师群体的执业境遇

盎格鲁—撒克逊晚期以来的铸币法律均严格规定了铸币师的职业活动。首先,铸币师必须在规定的地点进行货币铸造,所铸货币的重量和成色也必须符合法定标准。阿瑟尔斯坦时期的“格拉利铸币法”曾明确规定“货币应在市镇里铸造”,所以铸币厂设立在城市,而不能是任何偏僻隐蔽的地方。铸币师在自己的工作间里对旧币

和白银进行检验和熔化,并铸造新币。因为要对货币的重量和成色负责,铸币师在所铸货币上压印有自己的名字。^{[11]88}其次,铸币师还负责货币兑换。王室法令曾规定“仅允许铸币师负责货币的兑换”。^[12]铸币师用新铸货币购买白银和兑换国外和本土废弃的货币。以温切斯特的铸币师为例,他们在自己的工作间里铸造货币,并在自己的兑换所里进行货币兑换,二者分别在该城的不同建筑中进行。^{[1]547}据《末日审判书》记载,当时市场与铸币厂之间的距离不超过 15 英里,正好为一个人一天往返的路程,这样便于顾客前来兑换货币。^{[11]88}从以上分析可知,在 973—1158 年货币定期重铸期间,铸币师负责货币铸造和兑换,可谓货币事务的实际管理者。

同时,中世纪英王严惩铸币师的违法行为和铸币师群体职业生涯的长短以及服务范围的大小,均能体现他们的执业境遇状况。铸币师负责货币的铸造和兑换,掩盖了他们从贵金属的熔炼和货币重铸中获利的事实。^{[11]88}铸币师经常利用职务之便,与商人勾结铸造低劣的货币,或参与削剪货币,这些违法行为使他们获利丰厚,但却扰乱了正常的货币流通。因此,自盎格鲁—撒克逊晚期以来,英王均采取严酷刑罚打击伪造和削剪货币的行为,规定“凡参与伪造的铸币师将失去一只手或判处死刑”。^{[3]24}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在 1125 年英王亨利一世曾召集并审讯了全国参与伪造的铸币师,最终判处他们中的 94 人切除右手。^{[4]62}

铸币师职业生涯的长短,亦能体现其执业境遇。铸币师的职位较为稳定,职业生涯通常也较长。如胡内文(Hunewine)曾于 10 世纪 80 年代至 11 世纪 20 年代参与了德文郡和萨默塞特郡的货币铸造。^{[7]73}而奥斯福特(Osferth)参与了自埃塞尔雷德二世第 15 种类型货币到“忏悔者”爱德华“尖头盔”型货币的铸造,职业生涯长达 35 年之久。^{[13]14-15}同时,也有部分铸币师的职业生涯较为短暂。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林肯铸币厂 40% 的铸币师中只参与一种货币的铸造,而仅有 60% 的铸币师连续参与两种及以上货币的铸造。^{[13]14}总体而言,大部分铸币师参与货币铸造的行为较为规则,而个别铸币师则只是偶尔参与其中。^{[13]14}

铸币师活动范围的大小是其执业境遇的重要表现。铸币师为多个铸币厂服务的传统形成

于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并被诺曼王朝的君主所继承。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一些铸币师经常同时为两个以上的铸币厂铸造货币。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以下原因所造成。首先,不同铸币厂使用相同的铸模,而铸模上压印的是同一个铸币师的名字。在克努特发行“四叶”型货币的斯伯里(Cissbury)和奇切斯特两个铸币厂就曾使用相同的铸模。^{[6]3-4}其次,丹麦人的入侵和丹麦金的征收。丹麦人的入侵迫使部分铸币师向更为安全的地方流动。如1003年威尔顿(Wilton)遭到入侵后,其铸币师就来到了索尔兹伯里。^{[6]4}而丹麦金的大量征收也促使伦敦和周边地区之间铸币师的流动。^{[6]4}如在埃塞尔雷德二世发行“长十字”型货币时(997—1003年),伦敦铸币厂的铸币师同时为赫里福德、白金汉和罗切斯特等地的铸币厂服务。^{[6]4}再次,为了获得铸币原材料,铸币师往往去多个地方用新铸货币兑换旧币和贵金属,这就使得他们不能固定于一地。埃塞尔雷德二世时期发行某种类型货币时,铸币师奥斯福特同时为伦敦、塞特福德和罗切斯特三地铸币厂服务,而之后还活跃于另外三个铸币厂。^{[14]43}

诺曼王朝继承了铸币师在不同铸币厂流动,或同时在多个铸币厂发行货币的惯例。11世纪末的铸币师阿尔芬活跃于苏塞克斯郡的佩文西(Pevensey)和肯特郡的桑德威奇(Sandwich)两个铸币厂;^{[7]73-74}1150年斯蒂芬发行VI型货币时,铸币师罗德伯特同时服务于伦敦、坎特伯雷、黑斯廷斯和里辛(Rising)四个铸币厂,并参与了之后不同货币类型的铸造。^{[7]74}同时,诺曼征服后的铸币师还出现了永久性流动。铸币师蔡尔德(Cild)从威尔特郡的贝德文(Bedwyn)到了同郡的莫尔伯勒(Marlborough);普瑞特里克(Brihtric)从埃克塞特来到了萨默塞特郡的汤顿(Taunton)。^{[6]4}由上可知,铸币师在较短的时间内往往在多个铸币厂间流动,而货币铸造中的间歇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可能。^{[7]74}

中世纪英国铸币师的职责在于铸造和兑换货币,但常因参与伪造而受到国王的严惩。铸造货币是一种持续而稳定的工作,因而铸币师拥有较长的职业生涯;同时,由于铸造和兑换货币的需要,铸币师可在不同铸币厂之间流动。总之,铸币师的职业活动受到王室法令的控制,但有一定的自由性。

五、铸币师群体的社会地位

铸币师因参与铸造货币,得到了国王授予的免税和免租金的特权以及赠予的土地,加之职业的世袭使之日渐形成了显赫的铸币家族。这些使得铸币师群体拥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大量的社会财富。

首先,免租金和免税权是中世纪英国铸币师的特权之一。铸币师群体因参与货币的铸造和管理,英王授予他们一些特权,如免税权和免租金的权力。据1130年《财政署卷档》(Pipe Rolls)记载,铸币师托维斯(Tovius)曾在特威纳姆(Twynham)、温切斯特、伦敦等地参与货币铸造,并享有免税权。^{[7]69}同时,在忏悔者爱德华时期,为了奖励铸币师,国王规定温切斯特的铸币师享有租用房子免租金的权力。^{[6]9}另据《末日审判书》记载,铸币师是国王的免租金租客,例如沃灵福德(Wallingford)的一位铸币师拥有一座免租金的房子,只要他为当地服务,就可以一直享用。^{[6]9}

其次,职业世袭使铸币师群体逐渐形成显赫的铸币家族。中世纪的货币铸造,不仅需要铸币师具有专业的技能和一定的文化素养,而且也需要他们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就使得铸币师的职业具有鲜明的世袭特征。大概从忏悔者爱德华时期开始,铸币师成为世袭的职位。当时的法令规定,只要继承人愿意支付20先令接班费(relief),不仅可以继承其父辈的财产,而且还可以延续铸币师的职位。^{[3]28}因此,自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起,铸币师的职位多在某些家庭成员内部世袭承继。学者西蒙斯认为,12世纪伍斯特铸币厂的伍尔弗里克(Wulfric)及其儿子阿拉德(Alard)均为铸币师,并曾同时为当时的英王服务。^{[1]572-578}南丁格尔也曾对11世纪末和12世纪早期伦敦的德尔曼(Deorman)铸币家族进行过分析,德尔曼曾在伦敦为忏悔者爱德华铸造货币,在科尔切斯特为国王威廉一世铸造货币;德尔曼的四个儿子阿尔格(Algar)、奥德加(Ordgar)、西奥德利克(Theoderic)和埃德温(Edwin)均为铸币师,他们曾为威廉二世或亨利一世铸造货币。其中,阿尔格和西奥德利克曾在伦敦和赫特福德的铸币厂服务。^{[14]41-42}而西奥德利克的儿子和孙子也是铸币师,并在伦敦等铸币厂参与铸造了亨利一世最后一种类型的货币和斯蒂芬统治初期的货币。^{[14]42-43}铸币师职位的世袭,

不仅保证了货币铸造的连续性和货币制度的完整性,而且也使得铸币师家族拥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再次,铸币师拥有较多的社会财富。铸币师因参与货币铸造,往往得到国王的奖赏,赠予土地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此处仅以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出身塞恩阶层的铸币师为例进行分析。铸币师杜蒂戈(Dudig)曾被国王阿尔弗烈德大帝授予威尔特郡的土地,马格尔斯森(Maeglsiothen)被国王埃德威格(Eadwig)授予斯塔福德郡的土地。^{[7]71-72}另据《末日审判书》记载,铸币师德尔曼拥有赫里福德郡16海德的土地,主要位于当地的沃克(Walkern)和沃顿(Watton)两个庄园。^{[14]39}诺曼征服之后,德尔曼的土地得以重新归还,因此其后来的继承人继续拥有这些土地。^{[14]39}

同时,铸币师负责货币铸造和兑换,能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加之,其享有的免税权和免租金等特权,也有利于财富的积累。这使得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969年,一位跛脚的牧师得到了温切斯特一位铸币师的热情款待,据其回忆,这位铸币师拥有一座大房子和大量的珠宝,并有仆从服侍,他还经常外出参加各种宴会。^{[2]166-167}铸币师富有的程度还可以通过罚金和债务的多少来体现。据亨利二世时期的《财政署卷档》记载,在斯蒂芬统治时期,铸币师维尔切利努斯(Walchelinus)因在德比(Derby)发行不规则的货币而被判罚100镑,且顺利交纳。^{[7]69}1130年的《财政署卷档》记载了多位铸币师所欠债务的情况,其中温切斯特的铸币师赛耶德(Saiet)所欠债务高达278马克。^{①[15]}

综上所述,在973—1158年英国货币定期重铸时期,铸币师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群体,他们多出身于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主要负责货币的铸造和兑换,是货币事务的直接管理者。在货币定期重铸中,他们依据王室法令参与货币铸造,保证了货币的高标准(重量足,成色高);同时,他们还承担着用新币兑换旧币和购买白银为货币铸造提供原材料的重要使命。由此可见,铸币师群体的存在是保证货币定期重铸制度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故有学者认为,在中世纪英国的城市里,铸币师是除王

室官员之外最重要的群体。^{[14]34}

参考文献:

- [1] D. J. Symons. The Moneyers of the Worcester Mint, 1066—1158: Some Thoughts and Comments [C] // Barrie Cook and Gareth Williams, ed. Coinage and History in the North Sea World c. 500—1250. Leiden; Boston: Brill, 2006.
- [2] Ian Stewart. Ministri and Monetarii [J]. Revue numismatique, 6e série—Tome 30, année 1988.
- [3] R. S. Kinsey. Anglo-Saxon Law and Practice Relating to Mints and Moneyers [J]. British Numismatic Journal, 1958—59 (29).
- [4] George C. Brooke. The Medieval Moneyers [J]. British Numismatic Journal, 21 (1931—33).
- [5] Veronica J. Smart. Moneyers of the late Anglo-Saxon coinage: the Danish dynasty 1017—42 [J]. Anglo-Saxon England, Volume 16, December 1987.
- [6] Martin Allen. Mints and Money in Medieval England [M].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7] C. E. Challis. A New History of the Royal Mi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8] Ian Stewart. King John's Recoinage and the Conference of Moneyers in 1208 [M]. British Numismatic Journal, 1989 (59): 41.
- [9] Peter Spufford. Money and Its Use in Medieval Europ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95—97.
- [10] Veronica J. Smart. Scandinavians, Celts, and Germans in Anglo-Saxon England: the Evidence of Moneyers' names [C] // M. A. S. Blackburn, ed. Anglo-Saxon Monetary History.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1] M. T. Clanchy. England and Its Rulers, 1066—1307 [M].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6.
- [12] John D. Brand. The English Coinage 1180—1247: Money, Mints and Exchanges [M]. London: British Numismatic Society, 1994: 25.
- [13] H. R. Mossop. Lincoln Mint c. 890—1279 [M]. Corbitt & Hunter Limited: Newcastle upon Tyne, 1970.
- [14] Pamela Nightingale. Some London Moneyer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nglish Mints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J]. Numismatic Chronicle, 1982 (142).
- [15] Ian Stewart. Moneyers in the 1130 Pipe Roll [J]. British Numismatic Journal, 1991 (61): 5.

[责任编辑: 翟 宇]

① 1 马克=2/3 镑